

史籍典录 文史新风

【编者按】

海南省近年来重视对东坡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使得社会各界的相关学术成果不断出现，最近问世的《东坡文库》第一批11册便是其中的精品。该文库计划以每年约出10册的节奏，到2037年苏轼诞辰1000周年时出齐100册。为此，海南日报文化周刊将持续关注这些学术成果，以及相关研究者的治学故事。

首批11册《东坡文库》结集出版，可谓名家荟萃，共襄文化盛举。海南文化从东坡先生而幸运，东坡文学的流风余韵沾溉海南，其卓著思想为海南文化建设提供指引，其执政为民理念为当代海南社会政治建设提供参考。

在已结集的《东坡文库》学者成果中，王水照先生（1934年生）是一位已届92岁高寿的研学鸿儒，其于2025年获上海市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所著《王水照与苏轼研究文存》为文库倍增光彩，该著探讨了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政治态度以及“终极关怀”等，其对当代东坡文化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谢桃坊先生（1935年生）于2020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称号，在词学、敦煌学、国学、客家学研究方面成就显著，其成果《谢桃坊与苏轼研究文存》探讨了苏轼早期诗歌创作及其艺术渊源、苏诗的评价和诗学思想等问题，其研究为后来者打开了一个扇窗。

张高评先生研究宋诗已四十余年，其所著《苏轼、黄庭坚与宋诗特色》从宋诗的定位和价值问题切入以探讨苏轼等人会通诗、画、禅的创作，指出东坡会通儒释道，化成诗词文赋，反常而合道，可谓肇基之论。

阮忠先生的《苏门文学综论》，是东坡文化专题研究的一部力作，该著先提出“苏门文人群落”概念，而后进入苏门诗歌论、词论、古文论、骈文论、辞赋论各专题研究，涉及苏氏父子、苏门词客、苏门弟子等各方面关系、交流与创作，立体再现了苏门文学创作的因缘、成就与影响，可谓东坡文学研究之楷范。

曾明先生的《苏东坡的活法》探讨了苏东坡的“师法”与“活法”、“无意为文”“有为而作”等问题。

杨胜宽先生的《苏轼的文学创新与文化传承》探讨了苏轼的文学理念创新与文化基因的生成机制，苏轼文风受到的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佛禅文化影响等问题。

王兆鹏等所著《苏轼的多维观照》则深入探讨了东坡范式、对词的变革等问题。喻世华《苏海泛舟论集》探讨了苏轼与章惇的关系，苏轼与同僚的相处之道及其启示等问题。

舒大刚等所著《三苏经学论集》则是聚焦于研究三苏经学思想的一本重要论著，该著重点探讨了三苏的经学观、经学著作体系和三苏六经论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关于东坡承父命以作《易传》，推明上古绝学以作《书传》，发孔氏之秘以作《论语说》，皆有深详考辨。该项研究为推动东坡精神、东坡哲学和东坡思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坡文库》的出版极具创意，规划着眼于长远，其作者阵容强大。据《总序》介绍，《文库》将每年以10本左右的速度出版，计划在2037年苏轼诞辰1000周年之际出齐100本东坡研究高水平成果。据了解，《文库》秉持“文献奠基，学史先行，综述选粹，自主创新”的编纂理念，以海南省级“东坡文化研究”专项课题招标、《东坡文库》成果转化资助、特别委托，以及学者自由投稿等方式，为《文库》高质量出版提供坚实保证。

从《文库》已出版成果来看，东坡文学方面研究成果已然较为丰硕，但在东坡哲学、经济、思想、政事等方面，研究尚显薄弱，尤其是对“海南三书”的研究，还未曾被学界充分关注；苏轼与各地的关系，东坡文化在海外传播研究等方面，也有待加强。

据悉，《文库》近期组稿方向为“百年东坡文化研究成果评述与选粹”，包括“东坡+地域”“东坡+域外”“东坡+人物”“东坡+专题”等诸多板块，将系统地梳理和评述十九世纪末以来有关东坡文化的研究成果，还启动了“苏轼研究文献综录”系列撰稿，将在“东坡精神”“哲学思想”“生命智慧”“文艺美学”“文学”“军事学”“法学”“词学”等专题上，进行成果发覆与文献梳理。同时，将采取史志体编撰方式，编著多卷本“东坡文化志”，以“历史资料+学术考据”的方式，对东坡的“经籍文献”“艺文纪念”“书画金石”“地理行迹”“师友交游”“知识体系”“东坡案”等，进行跨领域、多学科的综合性汇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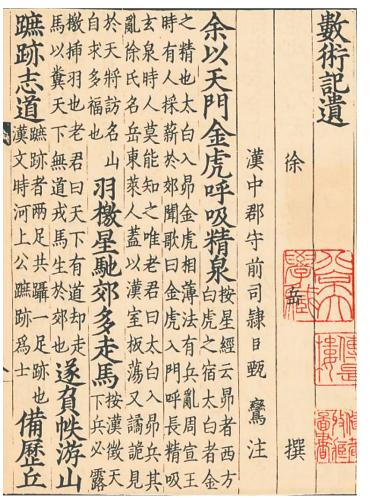
## 传中华经典 创海南品牌

■ 何光顺

## 《东坡文库》

南宋古本《孙子算经》。上海图书馆藏

南宋刻本《数术记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里得《几何原本》的中文翻译，后于次年正式刊刻出版。清代以后，在康熙皇帝的提倡下，国内数学界出现了一个中西方交流的小高潮。

从14岁起，康熙就跟随传教士南怀仁学习几何学、静力学和天文学，之后又跟随传教士安多学习三角和代数。成年后，康熙已能熟练掌握比例规、照准仪、象限仪、水平仪、罗盘仪、天文钟等仪器工具的操作方法。在学习过程中，他还首创了“元、次、根”等方程术语的汉译名，并有《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积求匀股法》等数学论文传世。

对于传统算学，康熙同样非常重视。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途经德州时，康熙召见了算学名家梅文鼎，君臣二人曾共同探讨历法和数学问题。可惜的是，梅文鼎当时已是73岁高龄，没多久就去世了。之后，康熙将梅文鼎的学生陈厚耀和孙子梅成召入京城进行培养。此外，钦天监官员子弟明安图、何国宗也都得到康熙的亲自指点，四人学成后分别被派往钦天监、蒙养斋等处任职。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笔友、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的建议下，康熙下令在畅春园蒙养斋内设立算学馆，后者也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皇家科学院”。经过考试，算学馆在全国招收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并由传教士白晋、张诚等讲授数学、天文学和解剖学等。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如有闲暇，他本人也会亲自来提点。

教育育才之外，蒙养斋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绘制全国地图并编写《律历渊源》等书籍。《律历渊源》包括《律吕正义》（乐理）、《历象考成》（天文历法）及《数理精蕴》（数学），后者收集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数学内容并吸收了传统算学的最新成果，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辨订古今之长短”的数学大著。

在中国古代史上，对自然科学情有独钟并十分精通的帝王仅康熙一人。可惜的是，因为科举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康熙一度提倡的数学学科最终后继无人。直到清末实行新学制后，国内数学才逐步向国际靠拢，并在陈省身、苏步青等著名数学家的带领下取得不凡的成果。